

1. 全球化时代的安全观

这几年，新安全观的字眼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报章传媒和学术刊物上面，成了相当热门的话题。我的印象里，大约是自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举国上下开始关注这一问题。金融安全，货币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环境安全，水资源安全，生物遗传基因安全，等等，不一而足；一时间，谈论诸如此类的“经济安全”成为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然而，从 1999 年科索沃危机和炸馆事件、以及 2001 年的中美撞机事件以及“9·11 事件”以来，传统安全问题重又回到安全探讨的中心，“决定因素”好像还是非军事安全莫属。研究重心的频繁变动，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的安全研究仍处在不成熟的阶段。大概是因为被称为“安全”的课题日益增多，加上难以确定不同的问题孰重孰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综合安全”“复合安全”“多层次安全”以及“立体安全”等概念。在我看来，它与国际上的研究趋势大体一致。在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包括人的安全、生态安全等等在内的综合安全问题，近一二十年来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①

^① 据新加坡一位教授讲，“综合安全”最早是由日本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来的；而“人类安全”概念，最先可能来自于 1994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人类发展报告》。1980 年 7 月，正式提交给日本首相铃木善信的《国家综合安全报告》中，列举了综合安全的六个目标，即：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提高保卫日本领土的能力；改善同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保障能源安全；保障粮食安全；应付重大地震。见阿米塔夫·阿卡亚：《人类安全：东方对西方》。它是 2001 年 11 月初笔者在泰国曼谷开会时，作者送给我的打印论文。这篇文章的译文已经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海外专稿〕2002 年年中刊出。欧美国家学者这方面的研究近些年比较多，例如，可参见：J. S. Nye and R. O. Keohane,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5, 1971, pp326-350；以及英国著名学者巴里·布赞对复合安全理论的开创性研究（Security Complex Theory, Buzan 1991；Buzan Et Al. 1990）。中国学术界的类似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比如可参见赵英的《新的国家安全观：战争以外的对抗与抉择》，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全球化：新安全观的时代背景

现在，人们所以对安全问题有这么多新的兴趣和议论，一个原因是大背景与过去有很大不同。这个大背景就是所谓的“全球化”。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正在经历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经济因素与军事因素加上信息革命方面的因素，同时突出地上升到安全问题的议事日程上，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区起着作用；与此同时各个地区的一体化过程都在加速，国家间相互依存变得越来越紧密，跨国性的问题和更大范围的危机，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和民族国家共同关心的焦点，安全问题的趋同和处理安全事务的合作变得日益紧迫。而所有这些的变化都在显示，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无论是积极面或消极后果，变化的方向沿着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轨迹演进；它同时预示着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重大转型。^①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帮助或限制，全球化进程的确在重新打造安全事务，重新塑造人们对于它的理解。可以说，人类世界在自身保障方面，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可能为我们带来好处和许多便利，也可能造成一些麻烦和大的危机。但几乎所有人都承认，这个新的时代还相当模糊，对它的认识极不充分，更谈不上很好地应对和驾驭它。

可以列举几个事例：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在1997年7月泰国出现货币金融风暴之前，更不用说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之前，整个亚洲和全球其它区域的宏观经济形势（单从经济指数上衡量）还是不错的，至少没有显露任何严重的危机迹象。也许有人会反驳，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1994年时的一篇论文《亚洲神话的破灭》里有过预测；我想，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克鲁格曼当时的确力排众议，看到了东亚“小老虎们”的某些问题，比如他指出，亚洲国家过分注重资源和资金的投入，但产品和结构的技术含量较低，然而他预见的，仅仅是增长速度将会趋缓、曾经风光一时的“起飞”奇迹可能不再持续，丝毫没有提及后来实际发生的金融风暴、社会动荡或政治麻烦，

^① 关于“全球化”的概念，可参见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1章“全球化：概念与动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1-46页。

没有预测到索罗斯式的投机、获利或失败，没有察觉由此开始的整个世界的宏观经济危机以及亚洲地区特有的政治转型危机。人对世界的认识，离实际情况相距甚远。由亨廷顿教授的一篇论文《文明的冲突？》所导致的、至今仍未息的争论，也有类似的特点：这位哈佛大学教授预见，冷战结束以后，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多个宗教之间，会发生大的碰撞，甚至导致“文明间的根本对抗”；可他没有、也很难说明，为什么这些早已存在的差异，会在今天或遥远的将来，产生与过去的时代大相径庭的后果。是苏联的瓦解，还是科技的进步，抑或是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以及其它的什么因素在发生作用？这位名教授似乎做了一点暗示，又都没有肯定的结论。其实这怨不得他，形势终究比人强，在拿不准的情况下，含糊一点总比算命先生的断言要好，后者常常以假的药方致人于死地。再看一个事例：现在一打开电视，老听到大气污染、臭氧层被破坏、城市热岛效应等等说法，给人的感觉是，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展，生态问题日益严重了，但是，究竟严重到一个什么地步，是否会子孙后代造成恶果，是否会对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社会带来损害，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国家不太介意这所谓的严重问题，今后这些问题还可能朝哪些方向演化，多数人心中其实是没有数的。这可能正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表现：它把地球各个地块、各个国家、各种肤色的人拉得愈来愈近，关系愈来愈紧密，却又令他们处于一种很矛盾很惊恐又很混沌很无奈的状态。

我曾经指出：“人类的确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被感知的这个时代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世界大势表现出急剧变动的征兆，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第二，不论决策者或普通人，他们中的多数还没有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同变化的必然性相适应。所谓‘全球化’命题的提出，无论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一种理论，反映了试图解读这个新的时代和自我解惑的某种努力。”^①不论从什么角度考虑，对全球化的定义宜宽泛一些，留点余地为好。现在，已经有很多专家从不同角度做了这样那样的概括，经济学家多半指全球市场化、区域集团化、各国各地区在经济上彼此依存、跨国公司日益具有支配性影响等现象，社会学家讲的是都市化、工业化、现代化造成的各国社会结构的“同构”趋势，文化学家用这一词汇描述商业文化、大众娱乐排斥传统艺术的过程，政治

① 《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1页。

学家试图用它分析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浪潮或者国际道义和国际干涉的增强趋势，军事学家的所谓“全球战略”强调的是各国对高科技的重视、更开阔的决策视野和地缘军事观的扩展，等等；有人看重的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人说的是社会生活的某个侧面，也有人想要揭示世界的总体前景；一些定义重点放在全球化的“全球性”上，另一些定义锁定全球化的“化”字上。所有这些定义都含有“真理的颗粒”，但单个的陈述与分析，又都无法涵盖所有要素。看看各国专家们对全球化突飞猛进的20世纪的概括吧：“世界大战的世纪”、“意识形态和冷战的世纪”、“全球性政治转型的世纪”、“极端的年代”、“恐怖的年代”、“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历史终结的世纪”、“民主胜利的世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灭亡的世纪”、“极权主义退隐的世纪”、“各种‘主义’衰败的世纪”、“经济一体化的世纪”、“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的世纪”、“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世纪”、“技术变革的世纪”、“信息时代和人工智能的世纪”、“生产加速提高的世纪”、“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的世纪”；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我们应当记住它们的“真理颗粒”，同时避免各自的片面性和独断性，把它们的有用成分综合起来，再来描绘全球化的动态画面。目前各家各派探讨的不同安全话语，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没有明确定义、至少没有统一定义的“全球化”之上的，是由无数的“真理颗粒”，组成的但各自都有一定局限性的“立体画”。而我深信：第一，全球化是一个新的时代，这种“新意”不光是时间意义上的超越，更是内涵方面的更新，它已经并且将继续带来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和国家安全的新特点；第二，全球化既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即近代以来才出现的现代化进程，又是一个涉及当代国际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结构变革和剧烈震荡；第三，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带来比从前多得多的财富、机会、发展与和平，也可能扩大矛盾、差距、冲突和斗争。

全球化作为一个研究命题，在欧美国家的出现不过二三十年，在中国更只有十年左右。我认为，观察一下中国学术界对此命题的思考进展，不难看出其演进和深化的三个阶段，或者说，由简单至复杂的三个层次。也正是在此思考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它们可能预示着学术研究新的突破和我们国家新的跃进。

第一个阶段，用最简单形象的话讲，是对扑面而来的全球化大潮的“热烈欢呼和拥抱”。在改革开放事业欣欣向荣的中国，多数研究者强调

的是全球化的积极后果（尽管也有少数人分析“新的生态危机和发展极限”），几乎所有人看到的都是这一进程的“历史必然性”；尤其当谈到加速发展、扑面而来的信息革命与科技进步、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这种在“二战”以后极其明显的进程，说成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在中国，人们仿佛突然发现了一个新的大陆，一个提升综合国力和加速改革开放的巨大机遇。这类对全球化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看法，以及把全球化视为“纯粹客观的进程”的态度，既受制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始阶段的特点，也多少受到欧美未来学家研究范式的制约（如“罗马俱乐部报告”的冲击）和西方传媒“一边倒”宣传（如果可以使用这个不太准确的词汇的话！）的思想影响。总而言之，它反映出中国学术界接触全球化命题的“初级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对全球化带来的严重冲击及弊端的察觉和抵制，具有矫枉过正的特征。随着全球化问题一面的显化，尤其是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消极后果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不合理一面的突出，中国学术界及传播媒介对这一进程的批评意见大大加强，抵制的态度得到日益增多的公众赞同，不少有深度有个性的见解受到国外“新左翼”的影响或与之趋近。加上近几年国际上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传播媒体对此也做了许多渲染，中国的不少人也不自觉受到感染。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提示了全球化已经和可能造成的严重冲击及各种弊端，如南北贫富悬殊及科技差距的加大，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投机势力面前的束手无策，西方主流传播媒介和文化产业体现出来的“文化帝国主义”，一系列主要的国际法、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表现出来的“西方霸权”（如在联合国名下四处干涉的西方多国部队，国际货币基金对受金融危机冲击国家的“改制建议”，导弹技术控制机制和核不扩散机制上的欧美霸权及单边主义等等）。科索沃危机之后的这几年，中美两国之间的摩擦争吵和关系恶化，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大众传媒和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抵制心理。

第三个阶段属于“进行时态”，仍然处于探讨过程之中，并没有真正的共识，人们见到的只是新思维的端倪。依我看，它既是对前两个思想层次之优点的综合，更是对它们含有的缺失和问题的超越。新的认识态度继续承认全球化的历史性和不可阻挡性，包括这一进程所含有的客观性和巨大机遇；同时，它清楚意识到当代西方尤其是美国“新资本主义”在这一进程中的先发优势，深刻认识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

国家面临的严重压力。依据这种认识，全球化归根到底是肇始于欧美的现代化进程在当代的深化与扩展，对于所有国家来说，愿意加入与否、擅长驾驭与否，它都是一个铁定的事实、一把无法回避的“双刃剑”。近一时期中国人常常提到的“趋利避害”一词，形象地反映出对全球化命题新的认知。理论上讲，就像中国学术界在看待西方文化时已经取得的“创造性转化”的共识一样，对待全球化这一命题时，应当具有一种“创造性融入”或“选择性进入”的视角；换句话说，既看到发达国家的长处和中国的不足（加入的必要），也考虑到西方的主导地位和中国作为崛起之大国的责任（趋利避害），在保持对现有全球政治经济体制的批评态度的同时，与之进行多重的磨合，在介入的进程中逐步改造它，使较高阶段的全球化比较公正合理，也有助于更多国家更好发展。

全球化命题的深化，带来的当然不止是安全观和主权观的变化，类似的讨论及思想还有很多。简言之，全球化进程带来的，不光是器物层面的新的丰裕和急剧流动，经济层面的一体化和效率化，还有观念层面的巨大撞击和体制层面的加速变化，新思想的重大发现与新领域的重大开拓。仅就国际关系而言，在这一新的纪元，以往所说的“国际政治”已不再单纯是国家间政治甚至政府间政治，而是纳入了许多过去没有的要素、声音和力量，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政治”。在这种世界政治里面，对人的生存与发展命运的关注占有更大分量，“权力”已经不再只是政治的权力或政府的权力，它还包括了女性的权利与权力、生态保护组织的权利与权力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声音的权利与权力。在这种世界政治里面，全球性危机和机遇同时造成的，既是全球性的关怀和全球治理的需要，也是对民族国家及其管理方式的新的压力和要求。对全球化问题的执着探索，能够使我们发现从前不知道的许多东西，具备更开阔的眼界和胸怀。它有助于中国在迈向世界大国的道路上，迈出更快的步伐。

新安全观的不同视角

随着全球化命题探讨的深入，在中国学术界，关于“新安全观”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在我看来，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至少出现了如下三类“新安全观”，它们之间有某种交叉，亦有重心的不同，或

许能够互补：

一类是官方正式的解释^①。根据不同场合的说法，中国提倡的“新安全观”的内容是：在国际关系中，以平等、协商、合作的方式，促进各国安全和国际社会整体安全的实现；这种安全观是针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言的。在中国人看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西方大国，经常在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中指手画脚、横加干涉，造成了这样那样的不稳定和安全威胁。因此，这种安全观的主题是，对于安全问题，要通过协商与合作的方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得以解决。这也与中国与印度等国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本一致。^②我相信这种安全观是符合世界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的，也是与“二战”以后国际关系的总特点和发展趋势相吻合的。这种安全观依据中国现实和需要，特别提出：中国追求一种独立自主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它不针对第三国，反对任何军事同盟，自己也绝不称霸。应当说，它是对中国等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形势下的

^① 2002 年 7 月 31 日，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中国官方所说的“新安全观”。这份文件指出：“以对话与合作为主要特征的新安全观逐渐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之一。”“新安全观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新安全观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要求。”“中国是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1996 年，中国就曾根据时代潮流和亚太地区特点，提出应共同培育一种新型的安全观念，重在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安全。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多边、双边场合多次呼吁树立新安全观。新安全观已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与相互通报。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协作，是指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中国认为，新安全观的合作模式应是灵活多样的，包括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具有论坛性质的多边安全对话、旨在增进信任的双边安全磋商，以及具有学术性质的非官方安全对话等。促进经济利益的融合，也是维护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中国认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亚太地区更是如此。兼容并蓄，增进合作，才有利于共同进步和发展。为此，安全合作不仅是指发展模式 and 观点一致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包括发展模式 and 观点不一致国家之间的合作。”（载自《光明日报》2002 年 8 月 2 日，第 4 版）

^② 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可以参见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七一讲话”），以及近年来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钱其琛等中国领导人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每年一度的对话会议（所谓“10+3”会议）上的发言内容。

发展。

第二种主要来自经济学家、政府经贸官员、技术专家和军事人员。这种看法强调，所谓“新安全观”，是指在全球化和信息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对安全防范的概念和领域要超越旧的约束，延伸到以前不曾涉及甚至不曾考虑的领域，把狭隘的军事安全扩大到更宽广的范围，如太空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等；尤其是经济安全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强调，它吸收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些邻国的教训，把安全概念拓展到金融、贸易、货币、投资等等领域，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特别需要防范这方面的冲击。虽然看到新时代的一些变化，这种安全观却主要着眼于物质的层面，是一种防范的态势。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两位军队作家近年扬名中外的《超限战——对全球化时代战争与战法的想定》一书。这两位空军大校，特别重视新的不对称作战的方式和战法，强调在新的国际安全和力量对比形势下不能因循守旧，而要超出传统限度，以攻为守；背离经典“剑走偏锋”，以过去人无法和不敢想象的方式，置敌于死地，至少是保障己方不受对方致命威胁。^①

我自己也提出一种看法。或许可以将它看成第三种安全观。其中心思想，可以简单归纳如下：所谓安全，必须考虑国际关系与内政的联系，必须注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必须协调整体利益与个人需求；只有这几方面因素达到某种平衡时，安全才是有保障的和可预期的。它把国家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把外交与内政联系起来，以本国民众的要求和利益为中心，在尊重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法和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主要由各国政府和决策者）综合地考虑各种与安全相关的国际因素和社会因素，确立更加全面的防范意识或改进措施。这也是一种复合安全观或者说综合安全观。所说的“综合安全”（英文叫“comprehensive security”），是一种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安全，尤其是应当包括比单纯的物质层面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内涵；它有两层特殊含义：第一，从安全内涵上看，安全的内涵需要扩展，同时容纳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与新出现的社会安全问题，同时兼顾对外关系和对内关系；第二，从行为主体讲，安全范围需要扩展，同时容纳国家（state）和国家以外的多种行为体，使政府与民众的关系、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以及各族群之间的关系等

^① 乔良、王湘穗：《超限战——对全球化时代战争与战法的想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等“对子”受到更大的重视。

下面做些具体分析。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存在着很不一样的安全观念。比如，传统安全观是到目前为止仍占支配地位的安全思想，它的要点是：国际关系——不论古代现代当代——始终是无政府状态的，它缺少、也不可能具有各国内部那种强有力的统治秩序与权威，从而，这种无序和不安的状态给各国带来了种种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对领土边界的威胁，对民族生存的威胁，对国家主权的威胁，对各国统治本国的权力的威胁，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并且根据“自助”（self-helping）的原理，规划本国在国际角斗场上或“搏斗拼杀”或“韬光养晦”或“合纵连横”的战略和策略，如结盟制裁、确立均势、加强实力、军备竞赛，以及（偶尔地和部分地）借助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力量或威望。这种安全观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自身越强大，安全就越有保证；至于他人的安全需求，它是不太考虑的，说得严重一点，旧的安全观是以制约对手为出发点和基础的。然而，像国际关系理论揭示的那样，一旦各方都这样考虑，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局面，即所谓的“囚犯困境”：各国都在增强自己的相对实力，都怀疑对方的用意和举动，在缺乏世界政府和强制性力量的情况下，谁的安全都没有真正的、根本的保障。这也被称作“自我实现的预言”：自身安全被预设的对手所威胁所限定。以往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战略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以及各国政府关心的主要内容，无非就是加强本国实力（综合国力）和动员能力，设计各种各样的用于国家间博弈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展开外交、军事、国际法、联盟与裁军等“争取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古今中外，从“战国七雄”的争霸到“三分天下”的并立，从近代欧洲列强的争锋，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都是这种安全观占据支配地位，其中，以军事安全成为安全观的基本内容。它把国家角色放在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把哲学上所讲的“人性恶”和“互斥”作为世界观的根据，把人类社会以群体分居的历史视为经久不变的“斗争—妥协—再斗争”的过程之循环。它向人们展示的是一幅严峻、冷酷、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画面。它也是一幅“不打枪不放炮即为和平态势”的比较机械、比较单调的“平面示意图”。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特别是两极格局瓦解之后，世界战争、尤其是核大战的威胁逐渐减弱，军备竞赛的吸引力逐渐下降，而全球经济和

跨国公司的发展、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尤其是区域内经济合作及一体化的加快，以及生态危机、难民潮、走私贩毒、恐怖主义、信息爆炸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给世界带来了许多新气象、新矛盾、新因素和新趋势。旧式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相对减少和非军事性挑战的出现，孕育、推动了一种新安全观的逐渐形成。概括地讲，它的主要观点是：国际关系及国际格局，不是传统现实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恒古不变的，而是不断进步、朝着人类发展的“高级方向”演化的，因此，比如讲，国际关系虽然仍然没有完全克服无政府状态，但它具备了越来越多的协调和合作气氛及机制；国际组织与国际法尽管尚无法与国内政府与法律媲美，但它们毕竟变得比从前更有效和有力；随着边界作用的下降和主权意识的淡化，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很多全球性问题以及各国国内的一些矛盾已经不能用传统的治理办法和思路加以解决。在这种新形势下面，安全观必须加以扩展、转换和充实，它所应当分析和回答的，不只是与旧时的军事冲突和外交斗争有关的内容，而且要有对全球化时代新现实新问题的关注与探讨，如经济安全（又包括金融安全、贸易安全、货币安全、财政安全等多种内容）、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跨国犯罪与安全、核扩散与安全、民族主义与安全、移民与安全、社会矛盾与安全等等，甚至还应当从深层次分析国家主权在弱化时面临的不同性质不同方向的演变压力（是少数强国的“霸权约束”所致、还是来自地球村的“同舟共济”意识）；总之，新的安全研究要“综合”探讨的，是如何增进各国间的相互信任和共同安全，是如何建立更加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环境，使之更能促进国际关系演化和各国国内进步的国际格局，更有利于整个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秩序。很显然，综合安全观不仅在研究范围上宽广得多，它还有着与传统安全观不太一样的哲学认识论的思想基础，向世人揭示的是一幅复杂得多、充满变数的立体画面。

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均衡安全）

以往人们讲安全，尤其在国际政治领域，主要是指国家（民族）层次上的安全，如不受外来侵略、不被他国控制、不危害本国主权等等。事实上，这种观念今天仍然十分重要，因为民族国家仍然构成国际社会

大家庭的主干部分，也是最有力量、最有影响的部分，各国政府的对外交往和各种政策仍然是各种国际活动的中心。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最基本的权益都无法捍卫，例如领土任人分割，外交事务由外部势力操纵，或者经济和社会活动完全取决于本国政府不能左右的因素，那么，可以想象，不仅这个国家谈不上任何安全，而且，由此类国家组成的区域共同体或国际社会是不安宁的。近五百年来由欧洲发源、逐渐成为全球体系的国际关系格局，一再证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存在与维护，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各种国际事务有条不紊地展开、各种群体和行为者建立自身保障的主要基石。然而，趋势亦表明，即便在国际政治范围，安全问题绝不仅仅是、而且越来越不单是民族国家的事务，它要求人们用一种新的视角和观念，审视安全概念和规划安全战略。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综合安全”或“新安全”，指的是既包括民族国家的安全，也包括其他非民族国家单元在内的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或均衡安全。当然，到目前为止，这种安全仍然主要是由民族国家的政府提供和保证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有可能提出一种新的考虑和安排。

非民族国家的行为主体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说不胜枚举，分类的标准也因分类者的兴趣与要求而异。为了紧扣本章的主题，我把无关宏旨者撇开，将重要的非民族国家的行为主体及其安全利益，分作三个层面：

第一是个人的权利。我们的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每一个人都是各个国家及国际共同体的一个“分子”；个人的安全感（如是否经常焦虑、是否受到各种威胁、是否有自身保障等），乃社区、国家、国际社会之安全的最直观也最要紧的评价尺度。在当代条件下，对个人权利（包括不同族群）的尊重，对政府治下百姓福祉的关心，是国家实现本国安全和获得国际承认的重要前提之一。我曾经指出，民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对于强化或削弱政府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尤其重要。我们看到，所谓‘索马里现象’，是指政府不能运转、社会纲纪混乱、民众失去归位感和忠诚对象、最终不得不求助于大规模的国际干涉的情景。美国、英国、法国之所以能够在伊拉克北部建立‘禁飞区’，借口主要就是库尔德族人遭到了伊拉克政府的残酷镇压。……虽然主权问题一般都被放入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加以说明，国家主权与社会进步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离开了对各国国家内部事务的考察，我们不可

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国际关系。”^①从某种意义上讲，综合安全观念的提出，要求决策者和战略思想家比过去更加重视个人的价值和安危，重视各种人的权益的实现与保障，而不能把目光局限在国家间关系和对外政策本身，甚至让后者成为一种自我循环、自我服务的东西。可以认为，“人的安全”应当是新安全观（综合安全观）最本质的要求。归根到底，安全保障的对象是作为主体的人，要一切从人出发，一切为着人，而不是以人的利益的损失甚至放弃和牺牲为代价，去达到某个虚无的、非人的安全目标。世人经常能够看到，在一些国家，某些军工集体和财阀集团，出于狭隘的私利，在增强国家安全和军事能力的借口下，或者在打击某个特定的敌国的宣传口号下，使用各种合法与非法的手段，增加军费预算，支持特种科研，发射特殊装置，甚至窃听反对派的电话，制造各种冤假错案，滥用公权和公共资源，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和公民民主权利；在所有这些场景里，权势集团盗用了“国家安全”名义。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本来具有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处理得好，“大河有水小河满”；处理失当，两者皆遭损害。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国家当权者具有的优势位置，这一道理往往容易受到忽视或轻视。

第二是各种群体的利益。不论在国际社会，还是在各国内部，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促成了越来越多的不同团体和利益集团的出现，它同样使得传统国际关系学所说的“安全”变得复杂多样。由于经济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技术工艺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国界的传统作用的下降等原因，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越来越严重，单一政府的控制和处理能力却相对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以专门领域或问题为研究或处置对象的各种团体，有了施展手脚的更大空间。后面我还要专门叙述 NGO，这里不多讨论。它们色杂样多，形式特点一言难尽，但是，不论组织大小、范围广狭，总起来讲，各种非国家的团体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角色，而且从发展前景看，它们在未来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原因之一是联合国的支持和鼓励，另一点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世界“缩小和碎片化”趋势）。^②因此，在综合安全的画面里，不能不考虑各种团体的安全利益，尽一切可能对之加以顾及和平衡；当然，做到完全均衡和让所有人满意是不可能的，例如，生态

① 《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2章“主权观念及其制约”，第59~60页。

② 可参见王逸舟“国际政治中的非政府组织”，《东方》，1995年第5期。

保护机构要求降低经济开发速度，动植物保护团体希望禁止捕捉稀有动植物，女权保护组织呼吁男女真正完全平等，甚至还有一些在常人看来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利益集团及其要求，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以有限的资源和单一的价值尺度将它们彻底满足。然而，采取灵活多样、“和颜悦色”的办法而非简单粗暴的态度，用建设性“整合”而不是强制性压服的办法，是对待各种势力见长的非政府组织的合适途径，亦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以“开明”形象自我更新、不断提高的必然。不论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社会还是安定团结的国内社会，都应当而且可能给予各种团体以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更和谐的共处关系。这里，仅仅凭借良好的愿望和领导人个人的能力，是不足以公正合理地平衡各种差别甚大的利益的，有时强大的利益集团比弱小的集团获得了更多的国家资源和政府赋予的好处，仅仅是由于前者的权势和影响。因此，要使各种团体利益得到充分的表达及较好的满足，使不同群体的安全需求和相关利益有一个较好的平衡，必须建立有效的权力行使、权力制约和权力平衡机制。

第三是所谓的“全球利益”。过去人们讲的“国际安全”，实际上是“国家安全”的某种集合，或者说是“放大”了的国家安全，但在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国际安全不再限于国家的范围，而是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问题和需求相联系。近些年来，国际上要求重视全球性共同利益和“人类的类安全”的呼声明显地日益强烈，诉求的内容涉及人类的活动和其他人为因素造成的气候变暖、大气臭氧层遭破坏、大片森林被毁和田地沙化、核武器微型化后的核扩散、公海及极地资源被污染或损耗性开发、太空及外太空有可能变成少数军事大国的试验基地和竞赛场所等严重事态。^① 不管有什么差别，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这些事态和现象已经或可能成为全球性的“公害”，威胁到了整个人类的生存甚至地球作为一个星球的存在价值，而解决或缓解危机的努力又不能单靠个别国家的努力奏效，因此人们不能不超越旧式的国际法范围，对主权概念有新的诠释。从综合安全的角度观察，这里面的最大难题在于协调和处理各国的自主发展与全球的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它们彼此间经常存在着一种互相依赖又互相制约、互相支持又互相对立的复杂关系。

^① 可参见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版。

民族国家及其主权地位是国际法得以履行、国际合作得以建立的基础，但全球性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以致于如果没有必要的主权约束（不论自我约束还是外部性约束），以及使国家的议事日程与国际要求一致的安排，国家自己最终也有可能受到严重损失，包括安全利益的损失。换句话说讲，他国的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多的成为本国的安全问题，在很多场合，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否是与其它国家（包括整个地区）的安全与否越来越多地联系在一起。新安全观或者说综合安全观的提出，有可能使人们意识到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并且依照对各种问题重要性先后顺序的认识，逐渐确立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新的国内制度和国际安排。这是一个艰难的而又必需的过程。

总而言之，新的综合安全观要求人们在看待今天的国际安全时，树立新的时代观、战争观与和平观，同时要求把以军事安全为中心的传统安全利益同个人安全、团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利益结合起来，在它们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安全绝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防范问题，国家安全是与国际安全密切相关的，而且会变得更加紧密；安全只有在相互依存中才能得到更好的实现。也就是说，在一个科技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安全，必须是保障综合国力的改善与对外开放的结合，是自身发展和外部发展的结合；安全离不开多方参与和广泛合作，离不开与全球化时代各行为体的有机衔接。国际安全的实现，更有赖于各国这种新型安全观的确立，和各国对于人类面临的“同舟共济意识”的认同。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积极互动，是符合我们这个时代进步和人类要求的新型安全。

若干范畴的再思索

确立综合安全观，不仅要安全概念做出重新界定，也需要对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石做出重新界定。我以为，有几个理论范畴需要重新思考，即“国家利益”、“权力”和“政治”。

首先是国家利益。鉴于后面将对国家利益概念做专门探讨，这里只做扼要阐述。传统安全观以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利益”（英文是“national interest”，亦可译为“民族利益”）为最重要的根据，就是说，当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或威胁时，安全便受到了损害或威胁。因此，安全保

障的基本内涵便是保卫国家利益。原则上，这个道理是不错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国家利益”以及如何实现国家利益。^①依笔者看，存在两种国家利益观。一种基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之上，另一种则基于全球化理念。不管承认与否，传统的国家利益事实上“以邻为壑”。这是一种在热战年代（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和（特别是）冷战年代逐渐形成的观念。在这种国家利益观里，他国的国家利益的获得，往往是本国国家利益的损失；反之亦然。历史一再证明，这种权力政治学导致的国家利益观，对谁都可能造成危害，一心追求自身绝对安全的国家也最终受损。新的国家利益观力求避免落入这种“冷战思维”的误区。它首先承认民族国家仍然是今日世界格局中最基本的利益，把国家利益的追求视为合理的追求，同时把国家主权、民族生存与军事安全看成是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国际法的履行的重要前提。然而，它特别注意到全球化时代的新特点新趋势，注意到国家民族的安危及发展与国际共同体之“唇齿相依”的关系，注意到和平与发展、协调与合作的主题正在取代“战争与革命”、矛盾与对抗的基调。因此，新的国家利益观大大扩展了其内涵，修正了与冷战对峙时期相联系的某些内容，例如，它要求决策者不是简单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各种“主义”）的考虑设计和推广国家的对外政策，^②要求加大发展安全、贸易安全、金融安全、生态安全、移民或难民安全等内容在安全估计中的份量，要求以发展求稳定、以合作求和平，要求重视国际合作、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问题，要求摒弃旧式的一味“以邻为壑”、“远交近攻”、“先发制人”等博弈策略，代之以“睦邻友好”、“求同存异”、“合作双赢”等战略设计；尤其是新的国家利益观要求各个国家不是死守传统主权界限，而是灵活掌握、进退适度，“舍小利求大义”、以短期利益换取长期价值，用新姿态、新贡献，在全

本节不打算详细讨论“国家利益”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阎学通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5 月第 1 版）。在国家利益研究领域，这本书有开创性的价值，但今天看来它仍然持一种相对静态的研究方法，多少忽略了国家利益的变化性和外部实现过程。

^② 并非偶然的是，即便在外交政策上最意识形态化的美国，类似亨廷顿教授这种比较保守的国家利益观，也受到日益增多的批评。1997 年 10 月，笔者在拜会亨氏在哈佛的同事、另一位世界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和战略思想家约瑟夫·奈教授时，便亲耳听到了他对前者的“美国利益受到忽视”一文基本出发点的批评。

球化的国际社会“安身立命”。^①与前一种国家利益观不同，它把新时期的国家利益实现，与国家参与国际社会的建设，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建立共同安全的防护体系等等内容联系起来；本质上，它所追求的安全，不是封闭条件下的自我安全（和他国的不安全感），而是各国彼此信任和共同努力的合作安全。

由此，看出讨论“权力”和“政治”等概念的必要。如同传统安全观建立在传统的权力政治学之上一样，新的安全观须奠定在对“权力”及“政治”的重新思考的基础上。

以往的国际政治学分析，不光是谈论安全事务，在讨论其它问题时，也几乎把注意力完全聚焦在国家的实力、国家间的较量和国际斗争的问题等范畴上，所以，人们往往不无道理地称之为“权力政治学”（power politics）。一谈起“权力”（也译“实力”），似乎只有政治的权力、政府的权力、国家的权力和政治家的权力，连那些流行的“结构”分析，也多半是关于国家间的政治结构、超级大国和列强的等级结构及力量对比的结构等等，整个国际政治及国际关系仿佛完全围绕争夺国际权力金字塔的不同位置展开。并不奇怪的是，在以往的国际安全及国际政治研究中——不论中国外国，所谓“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分析显得特别发达，典型事例有各种战略战术分析（如战争目标、战争手段、战争进程以及信息论、决策论和博弈论等内容）和各种对外政策分析（如战略同盟问题、贸易战问题、大国关系问题、国际组织中的斗争策略问题等内容），而与上述“两枝独秀”相比，涉及广泛内容的所谓“低级政治”（low politics）分析时，则显得浅得多，典型事例如生态政治分析、贸易政治分析、金融政治分析、女权政治分析等等。追根溯源，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冷战格局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同美国人在战后的霸主地位有联系。正如英国当代著名国际思想家斯兰吉奇指出的那样：“美国人有一种国家中心主义的倾向，他们比较愿意把目光集中在民族国家的政府那里，分析国家的对外政策（政治和外交政策）”；“当他们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时，似乎是指一种狭窄的、有关国家对外政策的分支科学；他们对所谓‘战略贸易政策’的过分关切，同样反映出这种

^① 当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中谈到“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入 21 世纪”的命题时，我相信，他是针对某些美国人的“冷战思维”有感而发的。

偏狭性。’^①

新的综合安全观要求，以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和国家内部社会关系的全方位研究，逐步取代狭隘的权力政治分析，以新的“世界政治”范畴的探讨，逐步取代或充实旧式的“国家间政治”或“国际政治”的讨论；在这种讨论中，不光国家行为体，而且国家外的很多行为体都有参与事务、表达自我和修正议程的可能。确切地说，就是以新的更宽广更多元的权力观和政治观，逐步修正传统的、狭隘的国家权力观和政府政治观。首先，新的权力观大大扩展了“权力”的行使主体和范围，就是说，不只政府有权力、政治家有权力，而且企业界有生产权力，金融界有金融权力，知识界有引导权力，媒体和公众有舆论权力，恐怖主义集团或生态犯罪分子有特殊的威慑权力，全球共同体有国际道义和组织网络的权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用这种权力观观察，譬如讲，1997年出现的震动亚洲和全球经济的金融危机，就绝不止是一种金融现象，它更多反映着政治结构、生产结构和货币结构的内在联系，它所产生的巨大的冲击力破坏力绝非由政治家或部长们能够简单创造或缓解，而是由市场力量和国家力量及个人力量等等因素综合造就。这种新的权力观向人们展示的是真实的、立体化的世界政治，表现出国际经济政治化、国际政治经济化的日益强烈的互动趋势，以及各种因素组成的一种合力；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任何层次的力量、集团或个人，都只能是顺应而不是逆转这种趋势，适应而不是选择这种框架。顺便说一下，“国际政治”这个词，在英文中确实只有“国家间的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之含义；因此，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同行宁肯使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以表达更深更广的内涵。

其次，与之相应，新的政治观也要求人们重新思索“政治”的范畴；换句话讲，在新的思维方式里面，“政治”不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政治，仅仅是政府的政治甚至狭窄化为政治家的政治，而是表现为全方位、多层次、渠道广泛、日常生活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比如，金融危机创造着金融政治，环境保护失衡产生了生态政治，不同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推动着不同的生产性政治，核扩散和水资源短缺的新形势分别造成了新的核政治和水政治，社会稳定或社会动荡的局面各自构成了

^① Susan Strange,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64.